



● 鲁枢元 著

精神守望

東方出版中心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208880745

I267

L819

精神守望

鲁枢元 著



东方出版中心

888074

说 明

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知识出版社(沪),自1996年1月1日起,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

精神守望

鲁枢元 著

出版: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仙霞路335号
邮编200336)

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经销: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昆山市亭林印刷总厂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9

字数:200千字 插页5

版次:1998年11月第1版

1999年5月第2次印刷

印数:7,001—13,000

ISBN 7-80627-359-X/I·125

定价:18.0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文艺心理学家鲁枢元最近六七年间对“精神生态”问题进行深入考察之后写下的系列散文的结集。

全书分三辑收录了 21 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作者从自己富于质感的生命体验出发,以“人类精神的经典”、“思想界的浮士德”为旗帜,从那些真正的生命身上寻找精神资源,以人的本性、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与和解为问题诱因,用生动的笔触解剖具体的人与事,深刻地反思了当下人类生存的精神困境。其中第三辑《坂墩里》、《乌托邦之思》等文尤以通俗的文字抒写了作者接触到的质朴的人生,直捷地表达了作者审视现代人类生活时的忧虑与祈望,展示了作者的思考从感性到理性的运行轨迹。

自序

“疯牛病”的起因被查得天翻地覆，其原由之一据说竟是因为英国的“牛们”吃了患有“痒病”的“羊的脑髓”。

牛吃羊肉，真是亘古未闻！并不是牛们嘴巴馋闹着开“洋荤”，而是人们为了让牛们多多下奶、快快长肉，别出心裁地把羊肉羊脑羊骨头磨碎以后作为添加剂掺进了牛饲料，牛们吃下了羊肉，自己是浑然不知的，而羊的“痒病”的病毒便在牛身上变本加厉地酿成了“疯病”，罪魁祸首不是牛，也不是羊，是人。

人也未能免被其祸，喜欢吃牛肉喝牛奶的欧洲人率先感染上了“疯牛病”，一时间闹得西方世界谈牛色变。慌了神的男女们仍然巴望从现代医疗技术方面寻找救星，岂不知“病因”原本是那些“饲料加工的科学技术”种下的，治本的妙方也许并不全在现代科学技术那里。

牛是食草动物，有一个反刍型的胃，就其自然的天性而言是不吃荤腥的，然而人却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设法让牛吃下高蛋白的羊肉、羊脑，养牛业的效率提高了，牛产品的利润增加了，想不到要命的“疯牛病”也随之降临人间。究竟是“人算不如天算”，违背自然的人们现时便遭到自然的报应，手握万能科学技术的人类，也是不可以为所欲为的。

况且，欧洲的“疯牛病”风波未平，亚洲又闹起“禽流感”。我揣测，这样的“怪病”在即将来临的新世纪里将会层出不穷。且不要说非洲的“埃博拉”尚在逞凶肆虐，科学尚无法对付的“艾滋

病”正迅速波及全球并且已经开始了“更新换代”。

种种怪病的出现，意味着地球人类的生态危机已不仅仅是森林锐减、资源短缺、空气污染、水体污染，危机开始向着人类生存的内部和深处急剧恶化。现代人的病症，远不只是生理方面，更有心理方面、伦理方面、情感方面、精神方面的。

印度的某些教徒，曾对牛悉心供奉，那是出于他们虔诚的信仰；

中国的农夫，曾把牛视作家庭的成员，体贴照料，那是出于他们质朴的感情；

现代工业社会的业主们把牛视为工业生产流水线上的“产品”，视为超级市场货架上的“听装罐头”或“袋装食品”，那是出于他们工于计算的巧智。

当“牛”的境遇与遭际被人类强行改变了的时候，“人类”自己的境遇和遭际能够不被改变吗？

地球上的万物总是整体相关、互动相联的，海德格尔从人文的角度对地球生态系统的洞察是深刻的，他曾心情沉重地指出：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改变，在伤害自然的同时也伤害了人心。自然生态的失衡与人类精神的破损同时展开。在吃草的牛被人们强迫吃下羊的脑髓时，人的心肠也早已经变冷、变硬；当牛的生命成了工业流水线上的物件时，人的心灵也开始在商品交换中被渐渐物化。

失去同情、失去信仰、失去心灵、失去精神的人，还不算是病人吗？当人把牛弄疯了的时候，自己也已经失去了健全的神经。

心理学家埃里希·弗洛姆曾经断定：“在精神上，20世纪比19世纪病得更严重。”那么，21世纪呢？不久前，我看到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中岛宏近先生在第十届世界精神病学大会开幕式上说：全世界患有某种程度的精神紊乱的人已达到15亿。棘手的

是，人们在精神方面的病症更难治愈，而且，精神上患了严重病症的人多半忌讳承认自己有病。

继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之后，人类社会已进入所谓“信息时代”，相对于人的生存状态，有人把它叫做“第三次震荡”，生态危机已透过生态的自然层面、社会层面渗入人类的精神领域，人的物化、人的类化、人的单一化、人的表浅化、意义的丧失、深度的丧失、道德感的丧失、历史感的丧失、交往能力的丧失、爱的能力的丧失、审美创造能力的丧失，在日益加剧。这种精神生态方面的危机，反过来又助长了整个地球生态的颓势，拯救地球，恐怕还必须从改善人类的精神状况开始。

“精神生态”，是我多年前选定的一个研究课题，上述“疯牛病”种种只是顺手捡来的一个例证。由生态破坏而酿成的灾祸正愈演愈烈，几乎成为不治之症，令人悲哀的是，许多人对此仍然无动于衷，灾祸如若不直接降临在谁的头上，谁就依然认为天下太平。这种“精神麻痹”，实则也是一种精神的病症。

在“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之上存在着一个“精神生态”的层面，地球的生态危机同时也是人类的精神危机。“精神守望”与“自然保护”、“社会治理”应当成为齐头并进的行动纲领。

我所说的“精神生态”，其中包含这样两个命题：一是，“精神”作为人的一种内在的、意向的、自由的、能动的生命活动，在一个更为高蹈的层面上对地球生态系统发挥着潜隐的巨大作用。在地球生态系统的“岩石圈”、“大气圈”、“生物圈”、“技术圈”、“社会圈”之外、之上，存在一个“精神圈”，“精神”是地球生态系统中意义重大不容忽略的一环。二是，“精神”作为人类的一种生发着、运动着、兴衰着、变化着的生命活动，具有内在的能量吞吐转换机制，具有独立的与其环境交流感应的体系，它本身也是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开放系统，一个“生态系统”。只有把

“精神因素”引进地球总体的生态系统中来，方才有可能为日趋绝境的生态危机寻求一条出路。

有时我想，人类也许注定要走向终结，只是不知道将选取哪种方式终结自己，或许终结于一场核大战，从目前看这种可能性正在减少；或许终结于某些突如其来的“怪病”，从新近的势头看，这并非骇世之语；或许终结于因极度奢侈享乐而耗尽了地球上的资源；或许在肉体终结之前便已经熄灭了作为人的存在依据的精神之光。

然而，获救的企望从不曾放弃。西方和东方的哲人，古往今来无不把得救的希望寄托给“天、地、神、人”的和解与和谐。海德格尔喜欢荷尔德林的一句诗：“临近本源居住地，艰难地离开此地。”“此地”，是危机四伏的现代社会，“本源”便是“天”、“地”、“诸神”、“人与其他生命存在物”谐和一致的诗意栖居地。老子说过：“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的“道”，也是“本源”，是永恒的真理、至高的理念、终极的目的。

这样说已经很有些玄虚，我近来一直在想，能否把玄奥的生存哲学往生态问题上落实一些，使哲学生态化，同时也让生态学获得哲学的品位。现象学已经把传统的形而上学从虚渺的天外牵引进人们的“生活世界”，牵引进个人当下的直观之中，“最本源”的东西已经成了“最具体”的东西，生存哲学为什么不能呢？到目前为止，在宇宙中已知的亿万星球中，地球是独一无二的有生命存在的星体，而人类在地球上的出现更属偶然中的偶然，每逢想到这些，总是使我产生一种近乎晕眩的惊讶、敬畏、神秘，我们不妨姑且把地球上的生态系统看作宇宙间一个“绝对的”、“至高的”、“终极的”存在，如此，生态问题也就拥有了“本源”的属性，生态观念也就获得了“道”的内涵。

拯救大地，拯救天空，保护自然，守望精神就是“大道之行”。

道在途中，路在脚下。精神在行动中运行，人心与自然谐振，理想在实践中达成，这又是个人乃至人类走向“是其所是”的艰难历程。

历史当然不是从现在开始的，许多人早已经走在途中。那是一些善良美好而又敏感执著的人。比如，“罗马俱乐部”的创始人奥莱里欧·佩切伊就是其中的一位。在“罗马俱乐部”的诞生地、意大利的“林赛学院”，我曾惊异地看到大厅里供奉着一只动物标本：像鹿，比鹿瘦小；像猫，比猫矫健，披一身淡金色的皮毛，竖着尖尖的两只耳朵，炯炯闪烁的目光中带着若有所思的神气。院长告诉我，这就是“猞猁”，猞猁是一种富有灵性的动物，它善于敏锐地感觉到周围环境中细微的变异，又能不失时机地做出应变的行动。院长说他们学院的名字“林赛(lincci)”，意大利语的意思就是“猞猁”，林赛学院就是“猞猁学院”，“猞猁”是他们学院的图腾。佩切伊就是地球生态系统中一只杰出的猞猁。

这样的“猞猁”还有很多，不仅是在意大利罗马城这个秀木蓊郁的学院里，也曾闪现在麦加近郊的希拉山的洞穴里、印度恒河平原的田野里、中国泰山之麓的松林里。我总是渴望着自己能够倾听并记录下这些“猞猁”们从远处传来的那些聪颖而又幽微的话语。

这本书是我从事精神生态研究时写下的一些随笔和札记，多半是些印象与情绪的散片。书中谈论了一些已经作古了的人，尤其是一些文化人、艺术人，因为在我看来这些人当中具备了更多的人文精神气息。其中，那个拖着半截小辫子的中国老头儿辜鸿铭把人类文明看作“人类精神的经典”，那个被称作“思想界浮士德”的德国人马克斯·舍勒把“性情”看作“精神生物”的“人的核心”，还有，被爱因斯坦誉为“集善与美于一身”的非洲丛林医

生史怀泽，他的对于一切生命的敬畏之心，都曾给我以深刻的启迪。那位迟暮之年还要向着苍天出逃的托尔斯泰，那位历尽万劫仍不失赤子之心的梵·高，那位在凶险的官场倾轧中依然守定“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的苏东坡，全都以现身说法为人们精神生态的寻觅树下了路标。

科学越来越发达，而人却越来越无力；技术越来越先进，空间却越来越狭窄；商品越来越丰富，生活却越来越单调；世界越来越喧闹，心灵却越来越孤寂，这已经是不须逻辑论证的事实，几乎每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都有切身的感受。用不着每个人都去做学问，但“反思”与“怀疑”毕竟是精神的功能之一，我们是否可以想一想，还有无别的出路？

中国有句老话：进一步山高水险，退一步海阔天空。我们可否从“物欲”的世界退回一步，可否往“精神”的世界探出一步，也许，我们将发现一个多么辽阔、清朗、温馨、优美的天地。

愿我们同行。

目 录

自 序.....	1
----------	---

书生意气.....	1
尴尬辜鸿铭	17
东坡与刚峰	28
无奈的偏见	40
性情深处是精神——读《世说》兼及 M. 舍勒	51
梵·高的目光	63
舒适的图圈	73
逃向苍天	79

荒野的伦理	87
高处不胜寒	95
“掷”的消费.....	100
性与精神生态.....	108
错位的画廊——致作家张抗抗.....	116
我们与牠们.....	128
谗荆言说.....	144

臣本布衣·····	178
外婆的茅屋·····	190
坂墩里·····	201
阴阳界·死亡仪式·精神场·····	223
鱼树禅机·····	240
乌托邦之思·····	248
后 记 ·····	278

书生意气

气; disposition ou sentiment de l'âme, 精神的某种倾向。

——F. S. 顾赛芬

“知识分子”的字义,如今成了一个严肃而又深奥的学理问题。在中国以往的时代,或许因为读书识字的人少,这个问题要明白得多,没有什么“知识分子”,只有“念书的人”,或曰“书生”,与那些念不上书、不认识字的多数人界限是很清楚的。现在大家都成了读书识字的人,谁是知识分子,谁不是知识分子,谁是真正的知识分子,谁是冒牌的知识分子,争得剑拔弩张,别人不来改造了,自己反而“窝里斗”起来。日前看到某“知识分子”发表的一篇大作,从老子、孔子、屈原、杜甫一直骂到现在还活着的季羨林、萧乾、汪曾祺,这些人全都不够“知识分子”的分数线,能够及格的寥寥无几。作者为何如此尖刻,令我惊疑不解。对于被作者挞伐的那些死人和老人,我只感到同情,因为批判这些念书的人

毕竟比批判掌大权的人、赚大钱的人要轻松得多。对于那几位被作者赞美的人，我又有些担心，担心他们能否担负起文章作者赋予他们的扭转乾坤的重任。

余英时先生出版过一部广有影响的谈“士”的书，认为“士”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分子”，兼具古希腊哲人的理性精神、基督教的宗教情操、近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我读他的书又觉得他对“士”太偏爱了，把“士”理想化了，因而显得有点宽泛。

在我心目中，要表述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最简便的还是拈出“书生”二字。而且至今我尚且未见有谁对“书生”下过严格的定义，这使我感到写作时呼吸的畅快。

在我看来，“书生”并不完全等于古代中国所说的“士”，相同之处是都要读书学知识，不过，读的结果，书生更趋向于书，而士则趋向于仕。士更务实些，仕途上需要士去杀人，士也会操起刀来；需要去偷抢，士也会干起鸡鸣狗盗的勾当。“二桃杀三士”典故中的三位士，就是为了禄位相互杀了起来。“学而优则仕”，入了仕当上了都督、巡抚的书生已不算书生；而那些始终当不上官或后来放弃当官的读书人，做了“寒士”或“名士”的士，才接近于我这里说的“书生”。具体地说也许还要复杂一点，比如屈原、陶潜、苏东坡、陆放翁也都做过官，但骨子里是书生，屈原、陶潜做不成官的时候更像书生。现代人中傅斯年做过国民党的官，吴晗做过共产党的官，都还是一身书生气。如果能够用鼻子闻一闻的话，“书生气”与“仕宦气”是有些不同的。

书生不是圣人。孔夫子、孟夫子做到了“圣人”、“亚圣”，尽善尽美或臻于完美完善，被供奉在神殿里，连凡人都不是了，还有谁敢说他们是书生。后世的康有为，几乎也快成圣人了，也不好说他是书生。胡适在旧时代的读书人中做人做得太好，聪明又周到，一点傻气都没有，也戴上了圣人的光环，走出了书生的行列。

书生也不必一定是英雄、是救星。如鲁迅、李大钊、毛泽东，一生对着旧世界冲锋陷阵，建立起丰功伟业，彪炳史册，书生们多半都做不来。但陈独秀、瞿秋白却更像书生，一位自认为革命天才却被革命革得丢魂落魄，一位自谓搞政治如犬耕田力不从心，自己先承认了不称职，英勇就义前又写出了那么多的缠绵悱恻，不失书生本色。

当然，书生也不是商贾。君子不言利，是中国读书人的传统，且不管做得是否到家。往昔的读书人做生意挣钱的远不如现在多，甚至在我报考大学的时代，商业学院、财会学院仍然门可罗雀，现在却挤破了大门。曹雪芹是个书生，不知道维护自己的著作版权，现在的一些三流小说家也知道捧着自己的文稿到拍卖市场上弄钱。

是不是书生，也不能只看学历，像以前有人规定的“高中毕业”才算知识分子，拿到“博士”学位算大知识分子。写出《聊斋志异》的蒲松龄只是个秀才，曹雪芹怕秀才也不是，严复赶在满清末年屡试不第才去翻译书，熊十力没有正式大学的毕业证书，梁漱溟则只是一纸中学毕业的学历，不知他们能否称为“知识分子”？说他们是“书生”当没有问题。

书生，不是英雄、豪杰、神仙、救世主，也不是政客、奸商、痞子、无赖，书生只是天地间肉眼凡胎的普通人。与众不同的，就在一个“书”上。如果非要给“书生”下一个定义，那就是“书生”即“为书所生、以书为生、生于书中、书伴终生”的人。其中第一个“生”，指诞生，书生是读书读出来的，一个人只有读了书才有可能成为书生，书，生化出了书生；第二个“生”，是生计，书生身无长物，大多以读书、著书、教书为手段谋生，有的也去给有权势的人当幕僚或智囊，仍旧是靠了书本上的话出主意，是书养活了书生；第三个“生”是生存，书生相信书中的信条，迷恋书中的境界，

沉迷于读书看书的乐趣，别人生活在现实的社会里，他们往往是生活在书本里，或者古人的书本里，或者洋人的书本里，或者自己撰写的书本里，以往精明的世人把那些一头扎在书堆里的人喊作“书蠹”，算是看透了书生的本事。第四个“生”是生命，标准的读书人是“活到老，读到老”，“皓首穷经”至死离不开书本的，书是书生的命根子。这样去定义，我认为大抵不差。

往昔，书生与非书生的界限不必特别运用辩证或解构的方法去分析，自然是很清楚的。比如，民国初年曾经为窃国大盗袁世凯复辟帝位鸣锣开道、搭梯劝进的“洪宪六君子”，时议其中一个为纵横捭阖的政客，一个是落魄江湖的军人，两个是国民党人中的叛徒，另外两个才是正牌的“书生”。这两位书呆子，一位是大名鼎鼎的严复，一位是鼎鼎大名的刘师培。

严复一生中的主要精力用来啃书本，他率先向世纪之交的中国人翻译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孟德斯鸠的“法律学”、斯宾塞的“社会学”、穆勒的“逻辑学”，今天我们大家说来说去的“逻辑”一词，就是严复翻译敲定的。仅译介西方学术著作这一项，严复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也是不可动摇的。然而，这位学富五车的书生在晚年却参加了令人人掩鼻的“臭安会”，沾惹上一身的腥臊。读书万卷、译书数十万言的严复一贯是很有主见的，当年袁世凯任北洋大臣时曾有意笼络他，被他骂了个狗血喷头，说是“袁世凯什么东西？够得上找我！”康梁变法群情鼎沸，严复却大泼冷水，说康氏怕死，梁氏爱出风头，皆难成事。待到黎元洪做了民国大总统，此老又说怪话：“黎黄陂德有余而才不足，天下仍不会太平。”次次都被他说中。临到晚年却干下这么一件蠢事。事实上他可能是上了纵横家杨度的圈套，杨度一句“先生高卧，如天下苍生何？”打动了严

复的心，稀里糊涂在“筹安会”里当了个挂名的理事，事败后则成了中华民国通缉的重犯。老朋友林纾劝他赶快逃跑，他却又表现出临危不惧、赴难不辞的拗劲儿，决心为自己的失误承担责任、付出代价，展示出一介书生的本色：既有读书人的明白，又不乏读书人的糊涂。

“筹安会”中的另一位读书人刘师培，又名刘光汉，在近代国学研究领域，算得上一位“大师”级的人物。他出自书香门第，自幼博览群书、经史诸子、释道典册无所不通，且能诗善文，素负才子盛名。他宗古文之经，治训诂之学，以字音求字义，用古语通今言，在音韵学领域亦有大贡献，其一生著述凡 74 种，除了先天的聪明才智，不下一番苦功夫是弄不成的。对此，刘师培是很自负的，“文学穷典坟，头白勤著书”，“虽非明圣道，亦复推通儒”，乃夫子自道。作为一个读书人，刘师培的毛病是太热衷于政治，却又没有政治家的眼光和手段，而且又娶了一个风流倜傥、爱虚荣、贪享受的太太，常在一些关键时刻被“枕头风”吹昏了头脑。先是联手章太炎创光复会投身反满革命，后又被清廷收买进了两江总督端方的幕府；民国后不甘心在北京大学做一个清苦的教书匠，又到袁世凯的总统府当了咨议，袁氏倒台后，这位国民革命的元勋反而成了民国通缉的罪人，死到临头终于对自己的一生有了反省：“我这一生当论学不该问政。”盖棺定论，刘师培不可磨灭的行状仍在于他的读书、教书、写书的生涯中。辛亥革命胜利后，民国镇压反革命，曾有枪毙革命叛徒、反革命走狗刘师培的动议，急坏了另一位读书人章太炎，太炎以自己“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的身份致电有司刀下留人，其苦口婆心、征古喻今列举的理由竟是刘师培是一个读书人，革命政府不应当杀害一个真正的读书人。章氏在电报中说：